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
电影文化研究部专版《东北虎》：
弱势群体的复仇景观

■文/王霞

如她面对徐东，擦向他的筷子的那一巴掌有用。

近年来东北俨然成为中国地域电影(Regional Film)在空间生产中频繁跃出的时代意象。虽然这片时空凝滞的铁锈地带衍化自1990年代,但上个世纪的电影语言实难给出恰当的回音,东北曲艺推动的娱乐电影又远离它的现实存在。反而是最近十余年,伴随着影像民主化趋势和东北文艺复兴,不断地催动着一股“新鲜的东北影像”在主流视野之外野蛮而坚韧的生长。它们中最早登上院线大银幕的是张猛电影,最近几年杨荔钠、张律、耿军乃至李骏、梁鸣、蒋佳辰等更年轻的一波影人的东北影像浮出水面,还有一大批纪录电影人始终埋头于此,不辍地于商业之外进行着媒介耕作与影像生产。耿军的“鹤岗宇宙”,是其中极具代表性的。虽然唯一公映的《东北虎》于今年上画后,院线反响寥寥,但它于耿军独树一帜的影像系列里,仍是非常重要的。耿军的电影创作从早期的粗粭写实,已进入到荒诞现实阶段。他的创作团队也从最初三五个人的DV作坊,升级到拥有百余人组成的工业性制片模式。不变的是耿军对家乡鹤岗城郊这一后工业与后农业交叉的文化空间的持续关注。特别是他镜头里的荒诞现实,自觉地以“寒带电影”的体验方式,打通了现实素材的直感性和抽象性之间的对立,敏锐地抓住极端现实中瞬间的荒诞与诗意。为耿军电影做制片人的张献民称其是一种“低度象征”,也有人称之为逃离“凝固的东北意象”的“液态影像”。

耿军的电影创作从早期的粗粭写实,已进入到荒诞现实阶段。他的创作团队也从最初三五个人的DV作坊,升级到拥有百余人组成的工业性制片模式。不变的是耿军对家乡鹤岗城郊这一后工业与后农业交叉的文化空间的持续关注。特别是他镜头里的荒诞现实,自觉地以“寒带电影”的体验方式,打通了现实素材的直感性和抽象性之间的对立,敏锐地抓住极端现实中瞬间的荒诞与诗意。为耿军电影做制片人的张献民称其是一种“低度象征”,也有人称之为逃离“凝固的东北意象”的“液态影像”。

1、文化人与社会人

《东北虎》虽然集齐了耿军的鹤岗好友“团伙”的非职业演员,却第一次将叙事主体,从城郊的底层流民转向了市民阶层,并试图进入这个三线小城中年人的家庭内部。鹤岗宇宙的市郊空间,也演化为两部分,一边是由住宅区、学校、饭馆、公园与市集组成的无力感的市民空间,一边是由矿区工地、矸石山、荒原败屋与前者遥遥拉锯的郊野复仇空间。表面上影片讲述了一个“文化人”去找一个“社会人”为吃掉的狗复仇的故事。实际上却以所谓的“复仇”动作线投石问路,试图激发这个工业衰落的煤炭小城里面颓丧与倦怠的中年人群体,试探他们血液里最后一丝“往昔东北人”的生气。文化人指的是夜晚在学校做宿管、白天兼职开铲车的徐东(章宇饰),他摆荡在夜与昼、体制内与外的两份工作之间,也摆荡在待产妻子与情人小薇之间,自述“人老色衰”、“经济衰败”却勉强“家庭稳定”,他在平庸与乏味中消磨着平庸与乏味。社会人,指的是建筑承包商马千里(张志明饰),在小城楼市崩盘之后,一方面被一群翻脸后只认钱的亲戚朋友变本加厉地暴力追债,一方面被黑社会性质的开发商以及串通一气的催债公司欺压殴打,他经济破产、信用全无,还被家庭抛弃,住到了市郊偏远荒凉的一处破旧院落里,在挣扎与无助中验证着挣扎与无助。

两个核心角色的相遇是影片的叙事引擎,此片最具表达力的几个段落几乎都发生在二人之间的冲突与共情之间。耿军电影的荒诞性也由此衍生。不同的是,前作影片中彼此遭遇的难兄难弟,有着同样的身份:要么是极度贫瘠区域的抢劫犯,要么是人力抽空的社区里的骗子,在抢无可抢、骗无可骗的境遇里,耿军努力发掘所谓的“底层相称”中互取暖的可能。《东北虎》中由于加入了表达并不充分的女性互害一线,反而导致对人物现实处境的抽离感没有前作那么突出,分散了“复仇”动作线上的“文化人”与“社会人”之间的碰撞,也削弱了副线人物“弱势群体”的诗人与小二对“文化人”与“社会人”的反射与抚慰的力量。剧作整体荒诞感的层次与锐度削减了很多,这多少影响了“鹤岗宇宙”喜剧表达的特定节奏。

2、挫败者的假动作

耿军自称“寒带导演”,影像观念深受考里斯马基、罗伊·安德森和贝拉·塔尔的影响。不同与考里斯马基以纯粹实在的动作线推动小人物的悲欢命运,耿军的人物动作,还参考了罗伊·安德森式的庸人自取的隐喻性。所以“鹤岗宇宙”里的“打劫”、“诈骗”、“复仇”、“侦查”等等同样代表人物的单一动作线,被抽空了语义上的实质性,都成了假动作。所以影评人灰狼在《东北虎》中看到了德勒兹意义上的“虚假的力量”(les puissances du faux),但这个叙事上的虚假强力,却并非仅仅由于人物的“伤感的无用”和“行动的无能”。

徐东一次次驱车去找马千里,真的是在复仇吗?夹在追债人、讨债人与欠债人之间,马千里真正的动作线是什么?破案的妻子挺着大肚子,一次次上路查“小三”,却不

永远为人民谋幸福

——评电影《让这首歌作证》

■文/饶曙光

观念冲突、信仰冲突……

影片《让这首歌作证》以一种富有想象力、艺术张力的方式开头并且展开叙事,有效吸引了观众:2015年也门撤侨,失去护照的曹飞(黄俊鹏饰)拿着曹火星签名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小册子向大使馆求助,通过讲述二爷爷曹火星的故事以证明身份,最终登上了回国的临沂舰……1943年,曹火星(张傲月饰)参加了八路军铁血剧社,而他的长兄曹岱(王泽霖饰)则加入了当时的国民党,两人虽然身处不同的阵营,有着不同信仰,但彼此理解各自的选择。抗战迫在眉睫,革命根据地延安发表社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这给了曹火星极大的艺术启迪,他结合房山霞云岭当地“霸王鞭”的旋律创作同名歌曲,并领命四处传唱这首歌。抗战胜利后,《晋察冀日报》发表了这首歌曲,此举激怒了国民党当局,军统特务令其哥曹岱诱杀曹火星,此时领命的曹岱如坐针毡,陷入了使命任务与兄弟情的矛盾、对抗、撕裂。

影片《让这首歌作证》除了有更多对历史的挖掘和理解之外,在电影叙事方式上也采取了一个很好的方式,一开始就有很强烈的代入感。如影片一开始海外撤侨的段落,一首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让所有人尤其是中国人感同身受,热血沸腾。过去,我们非常熟悉一句话“凭着国际歌熟悉的歌声,我们能够找到朋友”,今天我们则可以凭着《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熟悉的歌声,迅速拉近互不相识的人的心理距离、感情距离,感受到作为一个中国人的骄傲和自豪。当我们看到那小女孩在亚丁湾的中国军舰上唱起这首歌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骄傲油然而生。所有的这些,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和奋斗的结果。

《让这首歌作证》聚焦于两兄弟之间血浓于水的兄弟情,寻找到了个性化的动机和冲突,可以与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达成最大层面的共情共鸣共振。

不过,兄弟之情虽然血浓于水,但信仰的不同终究导致了两兄弟分道扬镳。正是在这种兄弟情激烈的冲突和对抗中,影片成功地塑造出了富有历史和人文内涵的艺术形象。而富有历史内涵、人文内涵的人物形象的塑造和刻画,是所有电影尤其是主旋律电影成功的关键所在,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总之,影片《让这首歌作证》让观众看到了曹火星这样一个活生生的艺术形象,以及他如何完成了一首歌的创作及其传播。由这样一首歌的启发,影片主创通过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尤其是通过创造性的艺术转化,使之变成了一部好看的电影,一部可以让年轻观众喜欢的电影。

习近平总书记对电影工作特别重视,对电影提出了很多具体的要求,特别是他强调要用电影的方式来讲好党史故事。他语重心长地指出:艺术的方法有一千条一万条,但是最可靠的方法还是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深入研究历史。生活中不乏有史诗,关键是我们要有把史诗转化为高质量电影作品的力量,《让这首歌作证》就是这样一部高质量的电影。它一定可以获得全国观众的追捧,一定可以与我们当下的青年观众达成对话,能够与青年观众形成共情共鸣共振。

我也联想到河北影视集团、河北电影制片厂,长期以来坚持红色电影创作、重大主题电影创作,形成了电影界公认河北影视现象,形成了自己的品牌,形成了自己的影响力,创作生产出了很多重要的作品,如《周恩来的四个昼夜》、《血战湘江》、《古田军号》、《李保国》、《那时风华》、《吕建江》等,为中国电影的可持续发展、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独特的河北贡献。更重要的是,无论是中国电影人还是全体中国人民,都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我们更大的努力和贡献。

(作者为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

新时代儿童电影的新探索

——评电影《闪亮的军号》

■文/张阿利

红兵对老屋和老军号的坚守不乏象征意义。孙子与爷爷围绕老军号展开故事冲突,展示了孙子郑思源对老军号由不理解到理解,也是对爷爷由不理解到理解的思想、情感的转变过程。

影片运用充满童趣的儿童化视域进行展现,借助游戏化的夏令营,建构了影片的叙事基础和情节构成。导演抓住少年儿童的游戏心态和行为特点,在郑思源刚刚到山村时,村里孩子用野猴嚎叫的声音这一特殊方式来迎接城里来的小朋友。没想到,山里孩子的游戏方式却引起城里孩子郑思源的误解,闹出笑话。为了消解误解,山里孩子们悄悄把苹果、核桃等摆放到郑爷爷家院子的小石桌上,以求获得郑思源的原谅。

影片中,导演还特别引入夏令营这一游戏性叙事结构,两支队伍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竞争,最终同时抵达目的地。片中小朋友们“全副武装”,身着迷彩服,配备现代化的无人机等装备,吸引了儿童观众的目光和注意力。应该说,尊重儿童的语言心理特点、行为方式与思想情感等,都反映出这部儿童电影在童趣意蕴方面的自觉追求和突出特色,实现了良好的艺术效果。

影片以军号这一特殊物象营造出饱含深意的影像意蕴,将富有地域特色的照金景观与深层表达的照金精神

加以深度融合。创作者的初衷并非仅仅是为了表达当下少年儿童小小的生活遭遇,影片中军号作为影像叙事的意象主角,仿佛一个被历史化和当下化的既虚拟又现实的特殊物象,爷爷珍藏的军号以及博物馆里陈列的木质军号,都承载着父辈光荣的革命历史,涌动着豪迈的革命激情。而孩子们夏令营队伍里的金属军号,展示的是历史的传承和红色基因的延续。

当郑思源因体能比拼受阻泄气而离开夏令营营区的时候,爷爷郑红兵在山梁上吹响军号感召着孙子重新回归团队;当大家找不到在山里受伤的爷爷时,郑思源吹响的军号成为最动听、最嘹亮的声音,成为连接起爷孙感情的心声。郑思源最后离开这片土地时,孩子们的军号声充满依依不舍之情。

可以说,以军号为结构线索的叙事在影片中编织出了一个生动鲜活的场景。此外,影片中大量关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照金纪念馆、薛家寨革命旧址、陈家坡会议旧址、照金北梁红军小学等的植入展现,都呈现出照金特有的大环境,这里也是主人公们生存和活动的大背景。郑思源由外界进入这一环境,并在此环境中耳濡目染不断进步,无疑也是新时代红色基因对少年儿童产生影响的有力表达,叫人久久回味。

(作者为陕西省电影家协会主席)

在全党上下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and 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之际,一部电影《让这首歌作证》的诞生恰逢其时。众所周知,党史学习教育最生动的教材,最活泼、最有效的方式,就是通过电影学党史。

前段时间笔者到中央电视台几个频道都去做了这样的节目,作为一个电影人感到很骄傲,因为在中国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重要时刻,中国电影人没有缺席。无论是革命阶段、建设阶段,还是改革开放、新时代,我们都有电影作品表现中国人民的奋斗历程,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为了民族解放,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全体中国人民所做了共同的努力。

中国电影人有一个优秀的传统,就是在中国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重要时刻,创造了很多红色的经典电影,一方面成为了历史的见证,另一方面在党史学习教育当中发挥了积极的、建设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不过,我们不能满足于过去已经取得的成绩,我们还要继续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用电影的方式来讲好党史故事。《让这首歌作证》就是这样一部新的红色电影,应该可以叫得响,传得开,留得住。

因为之前我也帮助策划过一部电影,片名就叫《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也曾经到过这首歌的诞生地北京房山堂上村,做过一些采访。但是,我们的采访尤其是对历史的研究远没有《让这首歌作证》影片的主创做得这么深入,他们真的是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在研究历史中获得了更多的历史资料,也获得了更多的艺术灵感。编剧王兴东和张佑展深入京津冀地区寻找曹火星的创作轨迹时,经过大量调查走访,发现了独特的人物关系和具有活力的戏剧情境:曹火星原名曹峙,字文山,其兄曹岱,字泰山,他长其十岁,抗战时期两人分别加入共产党和国民党;曹火星写了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激起兄弟之间的

近期,由陕西导演韩天善创作的电影《闪亮的军号》在全国院线上映。该片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郑思源放假后从西安回到老家铜川照金看望爷爷郑红兵(牛犇饰演),无意间接触到爷爷珍藏多年的宝物木质军号,了解到军号背后的革命故事;在参与照金红军小学的“小红军夏令营”活动后,原来体力不足、意志力薄弱的郑思源在与爷爷、教官、同学们的相处中,尤其在了解到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历史、感受到照金精神后逐渐成长,对爷爷的理解更加深刻、情感更加深厚,郑思源和小伙伴们的团结协作精神更强,意志也更加坚定。

影片建构了一个历史与现实相互链接,祖辈与孙辈思想、情感传承并相互认同的独特叙事空间。导演选取独特的视角和题材,紧扣当下城市孩子面临的一些现实问题,通过寓教于乐的方式使孩子们自然而然接受红色革命历史教育、传承红色基因。可以看到,影片为观众建构了爷爷和孙子这一对特殊的人物关系,这种关系与红色基因的传承相呼应,也在当下主场影像叙事中应用了历史闪回的叙事手法。

由表演艺术家牛犇饰演的爷爷郑红兵,长期坚持居住在山中老屋,他珍藏着那把父亲传承下来的老军号,并向人们不断讲述过往的革命历史。郑